

文学研究

2

二二

刊

文学研究

三
刊

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79357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1079357

封面装帧 方 肪

文学研究丛刊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1 字数 333,000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书号 10299·003 定价 3.00 元

目 录

- 2099/06
- 1 上海“孤岛”时期的杂文运动 杨幼生
- 35 蜚居待旦 心照日月 陈梦熊
——关于《蘼华集》
- 55 一幅清淡、明丽的“油画” 王文英
、——《法西斯细菌》艺术论
- 70 论田汉二、三十年代反映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
创作 张向华
- 88 论罗黑芷 应国靖
- 98 冯雪峰的两部未问世的长篇小说 包子衍
- 106 改革者的眼光 董德兴 楚 民
——蒋子龙小说创作得失谈
-
- 124 古代文论发展的历史承续性与批
判继承规律 陆海明
- 150 试论英雄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张怀久
- 178 比较文学方法的比较 武振平
——试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 199 “非理性心理描写”评析 嵇 山
——并答李文衡同志
-

231	婉约词再论	钱鸿瑛
247	论唐宋词中的小令	徐培均
266	蒲松龄小说中的反清思想	吴 慧
280	凌濛初戏曲理论三题	黄 强
295	中国工人阶级血泪生活的第一章 ——读晚清两部最早描写华工生活的小说	许国良
309	黄鹄游寥廓 赤子仰岱宗 ——读徐震客陈眉公两件往来书信	夏咸淳
316	关于法国十九世纪实证主义批评	张小鲁
334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理论初探	瞿世镜
359	异化、空想·人道主义	刘崇义
382	论文选译(一组) ——苏联一九八三年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	吴国璋译

上海“孤岛”时期的杂文运动

杨幼生

“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杂文更是时代的产物。

我国传统的随笔和小品文，自经鲁迅改造成与时代密切相联的杂文以后，就赋予了这种文体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它产生于中国最苦难深重的年月，成为革命的进步的文学家向旧社会、向帝国主义和一切腐朽制度进行无情揭露和冲击的最有力的武器。它是政治的，又是文学的，政治在于它的锋芒所向，文学在于它用以表达的艺术技巧。在这方面，鲁迅的杂文为我们创立了最丰富多采的典范。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溘然长逝。杂文运动并未因此而衰微，相反，由他影响和培养长成的一大批杂文作家，继承了他的事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把杂文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一九三七年“七·七”和“八·一三”，华北和上海相继爆发了抗日战争，杂文又在新形势下绽开了新的棘花。同年十一月，上海沦陷，只剩一片在英美法势力下的“租界”，暂时还算是打着“中立”牌子的特殊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抗日统一战线感召下的爱国力量，还能利用这个“孤岛”开展一些有限的活动。使人惊喜的是，杂文在这里竟也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阵地。

三个发展阶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上海，上海沦陷。待在“租界”里的上海人民，一度彷徨失措，文学界也一度处在沉寂的状态。许多报纸刊物，纷纷停刊内迁，不少作家也在向内地或香港转移。但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和爱国之士，并不认为需要把全部人员统统撤出，而把阵地拱手让给侵略者及其鹰犬；只要还有一丝战斗的条件，仍应把这里当成一把刺在敌人心脏里的尖刀。沉寂没有持续多久，同年十二月，报纸以《译报》为代表，期刊以《离骚》为代表，展开了试探战^①。夏衍实际负责的《译报》，以转译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的报导和述评的形式，向“孤岛”市民传播抗战的真实消息；挂刘西渭（李健吾）之名，实由阿英主其事的《离骚》，主要刊载一些学术性的论文。由于它们都是中国人所办，在日本人占领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限令华商报纸必须前去送检的情况下，注定了寿命不会长。《译报》出了十八天，《离骚》只出了一期，就先后被迫停刊了。

然而也不是完全无隙可乘。面临当时局势，英文和中文两种《大美晚报》的所有人史蒂于12月16日发表了一则“责任声明启事”，略谓两种《大美晚报》均为美商所办，“皆服膺报纸言论自由之精义，敢作无畏及切实之评论，及登载不参成见纯属事实之新闻”，“不受任何方面之检查”。这无疑对日本军阀的检查网撕开了一个裂口，同时也给“孤岛”上的爱国文化人一个很好的启示：挂洋商招牌，作中国人的喉舌。1938年1月，挂英商牌子的《每日译报》和《文汇报》相继出版^②。《文汇报》创刊的同

时,出了副刊《文会》,已有一些属于短评性质的文章出现。半个月后,柯灵主编的,几乎每天刊登一篇花边杂文的副刊《世纪风》象勇猛的武士,开始矗立在读者们的面前。《世纪风》发刊的前一天下午(2月10日),正碰上敌人向文汇报馆扔了一颗炸弹,第二天《世纪风》同读者见面,第一篇就是编者的《纸上漫步》:

手榴弹,在近一两个月来,曾经完成过不少大快人心之举。可是现在,连那些卑污的手也使用着它了。

但这给予被击者只有光荣。

只可惜圣洁的手榴弹被他们所亵渎了。

了了三段四句,气势磅礴,大义凛然,既显示了编者临难不畏的浩然正气,为《世纪风》的方针作了鲜明的表白,也为“孤岛”杂文奠定了战斗的基调。

5月1日,《每日译报》副刊《燭火》从“孤岛”地平线上崛起,也几乎是每天一篇杂文,它的主编是巴人。7月1日,《燭火》又改名《大家谈》,主编仍是巴人,而对时局和“孤岛”社会的干预更积极了。另一由亭长(恽逸群)主编的副刊《前哨》,文学性更浓些,也偶有杂文发表。其它文学期刊和副刊,一时如雨后春笋,蜂然而起,这就形成了“孤岛”杂文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从那时到1939年5月18日止,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杂文特点是:以鲁迅式杂文为代表的大量作品,虽然蒙受了“迂回曲折”的讥讽和攻击,其实是当时各种文体中锋芒最露、风格最尖锐泼辣的一种,其剔抉的矛头所向,既有对敌人、汉奸的揭露,也有对抗战阵营内部各种消极因素和人们灵魂中种种弱点的针砭。以1938年11月出版的六人杂文集《边鼓集》^③为例,在181篇杂文中,揭露侵略者残暴与虚弱者有38篇,揭露汉奸丑恶及阴谋者22篇,两者共占百分之三十三;冲击自己人灵魂弱点者19篇,揭露已有露头的各种分裂和挑拨言行者11篇,两者共占百分之十六;此外,歌颂和议论爱国行为者17篇,占百分之九,纪念鲁迅

及其他文化人的文章 8 篇，占百分之四点四，批阵营内部极左观点者也有 3 篇，占百分之一点六。这里可以大致看出那个阶段杂文题材的一般比重。

这段期间，在杂文方面还开展过三场大的论争，最大的一场是关于抗战开始以后，还需要不需要“鲁迅风”杂文的争辩，作为这场争辩的结果，发表了一篇由论争各方共同签署的《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④，对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专题分析。其它两次大论争，是关于周作人投敌的议论，和由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所引起的论争在“孤岛”的余波。

1939 年 5 月 18 日，由于《译报》、《文汇报》、《导报》、《大英夜报》、《中美日报》、《大美报》等刊登蒋介石的生产会议广播演说，被命令停刊两星期，其中《译报》、《文汇报》，由于复杂的原因，从此就没有再复刊。一下子两个主要的杂文阵地失去了，这对杂文运动的继续蓬勃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虽然同年 1 月 11 日创刊的《鲁迅风》（杂文作家的同人刊物，先后由文载道和石灵负责编务）还在继续出版；同年 7 月 1 日，周楞伽主编的《东南风》创刊，也常刊登周木斋、列车等的杂文；陶亢德、周梨庵等负责的《宇宙风》（乙刊）（同年 3 月 1 日创刊）也时而开辟“杂感”、“随感”一类的栏目，但杂文的气势，已不如前一阶段；从这时起至 1941 年 3 月止，形成了“孤岛”杂文运动马蹄形中的第二阶段——低潮阶段。《鲁迅风》出到第 19 期（1939 年 9 月 5 日），也告停刊；《东南风》则只出了四期（1939 年 9 月 10 日）。1939 年 12 月 1 日，柯灵继编《世纪风》后，接编了《大美报》的《浅草》。这仍是杂文作家们的一块阵地，但这里刊出的杂文，比起《世纪风》来，相对地已显得减少，不是每天都有了。1940 年 4 月，由于“孤岛”的复杂原因，后又由于《大美报》的主持人张似旭被敌伪暗杀，报纸于 27 日起停刊，《浅草》也随之夭折。同年 9 月 20 日，柯灵又接编《正言报》的《草原》，这里的杂文数量更少了，而

到1941年3月左右,由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以后明目张胆地反共,柯灵又不见容于这张由国民党三青团主办的报纸,终于被“挤”了出来。这一简短的回顾,使我们看清了:一方面当时的环境是何等恶劣,一方面,杂文作家们又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挣扎。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段低潮?唐弢在一篇总结1940年文坛的文章^⑥里把原因归结为“缺少一个可以作中心的副刊或杂志”。毁堂(巴人)在1940年1月13日的《大美报·浅草》上写过一篇号召《重振杂文》的文章,则认为:在客观上,这是一个“‘忠’与‘奸’,‘汉’与‘贼’,‘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提到更高的尖锐对立的阶段”;而主观上,“对于杂文的清算者的压力,却在杂文作家的胸中发酵,酝酿,终于寒了胆,叹了一口气放下笔来了。”的确,这些方面的原因都客观存在;但从主观上讲,发生于1938年10月至12月的自己阵营内部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最后没有为“鲁迅风”杂文作出科学的有力的评价,从而影响了这些杂文作家写作的情绪,恐也不为无因。很明显,从《鲁迅风》创刊号开始,“孤岛”初期杂文的那种锋芒已有所磨钝;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杂文的笔调开始向深沉方面发展了,题材更多地向历史、艺术、思想杂谈等方面开掘,而风格也抒情、象征多于愤懑和冲刺。还有一个原因,那是响应巴人号召的白鹤提出来的,他认为“新进杂文的缺少”^⑦。诚然,当时写过杂文的作者并不少,除上述几位老杂文作家以及孔另境、列车等外,当时的几位后起者如王元化(洛蚀)、林祝敌(品品)、闻歌(包文棣)等都写过一些杂文,但都不以杂文为专业,数量不多,客观看起来,撰写杂文的队伍中往往是那几个老面孔。这恐怕同样与一般从事文艺的青年“没曾理解杂文的本质”(白鹤语)有关。

然而暗林之中,总有鸣镝飞舞的。这里突出的,一个是柯灵,他不仅在《文汇》等六报被迫令停刊之后,写过一篇《无声的

上海》，告示人们：“大雷雨的前面，照例有刹那的静寂。突破这‘无声的上海’的，也必然是更伟大和壮烈的声音！”^⑦当1939年8月30日，《大美晚报·夜光》主编朱惺公被敌伪暗杀身亡，舆论界噤若寒蝉的时候，他还敢于在事发后八天，写了一篇《我要控诉》，惊呼“同是新闻记者，而且是一个副刊编辑的殉难，一周以来，为什么上海各报的副刊上竟没有一点表示？”决然地指出：“躲在壕沟里是可以的，但他本身必须是战士。对于暴行的噤默，却是对于战斗的回避。”^⑧一个是唐弢，他最突出的一篇文章是《蝇矢篇》。1940年12月4日，汪精卫的御用报纸《中华日报》的戏剧广告栏里，忽然出现了“打倒汪精卫卖国贼”的口号，弄得汪伪机关一时狼狈不堪。唐弢及时抓住了这个典型事件，写了这篇文献性的作品，作为历史记录留了下来，在尾声中他写道：“我爱春天，但我也愿意春天之前有一个最长的冬天，因为冬天是汰除苍蝇的季节。”“当苍蝇的生命归于消灭，白雪湔去所有的污秽时，春天在默默中萌育了。”^⑨此外如刊登在第17期《鲁迅风》上署名阿Q的《广播之类》，以说反话的方式讽刺“租界”当局，“好久以前，听说报纸上是不准登载中央政府要人们的广播演说的。而且因此《译报》、《文汇报》、《中美报》和《大美报》被罚停刊”。然而，“《中华日报》定已往宗旨准七月十日复版！”“第一天就登了汪精卫的‘广播演说’，……而且一点也没有遭到禁止。”暴露“租界”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软弱妥协。同期署名小D的《生意之道》，记录下一个鲜明的对照：当汪伪《中华日报》出来时，几家大报都登了广告，倒是那些卖报的老枪，却说“那是叛徒报，咱们不卖”，“饿死也情愿！”无疾的《剪贴之余》，直谈日军侮辱英籍侨民之事实，张伯伦的一味退让，日当局的无耻狡辩，以及汪精卫的汉奸谬论等等，都是这一阶段民族正气的峰峦。

说明这一阶段杂文虽处低潮，却未泯灭的另一有力证据，是1940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工运方面领导的北社出版了一套

列车主编的“杂文丛书”，第一辑四册：周木斋《消长集》、柯灵《市楼独唱》、列车《浪淘沙》和唐弢《短长书》（旧版）；第二辑一册：列车《两极集》。在此之前，介乎第一、第二阶段之间的1939年7月，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主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中，也出过一本杂文合集《横眉集》，收入作品的作家，除《边鼓集》中的六人外，又加了孔另境。

1941年1月17日，真反共假抗日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这一事件当然也影响到“孤岛”。敌伪一片高兴，而原来潜伏在这里的顽固派爪牙们也乘机活跃起来，“统一军令政令”之类的叫嚷，一时甚嚣尘上。他们满以为这样一来，一切爱国进步的文艺可以销声匿迹下去。岂料事物的辩证发展竟如此微妙，反而由此引起了杂文运动的新高潮。站在这次浪潮最前端的，现在是暨南大学一批被激怒了的大学生和与他们有联系的大中学生。他们先是出了一本《论军纪》的小册子，全面驳斥所谓“军纪”、“政令”、“领袖至上”一套谰言。1941年4月15日起，他们开始出版一种不定期的“杂文丛刊”，每辑以古代一把名剑的名称为名。共出了六辑^⑩。在第六期的《后记》里，编辑虚晃一枪，说：“战斗总是应该保持高度的机动性，负隅顽抗，总不是好战术，我们要转移阵地了。”但时隔没有多久，市上又出现了一种“棘林蔓草”的不定期刊物，每一分册均以一种生命力强韧的植物命名，一共出了三个分册^⑪。这就是转移了阵地的“杂文丛刊”。

体现这第三阶段杂文高潮的，并不仅是“杂文丛刊”一家。同年11月1日，文载道主编的杂文刊物《萧萧》出版；11月19日，不定期的《奔流新集》之一《直入》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历来比较温和的《宇宙风》（乙刊），从第四十一期（1941年3月16日）起，也恢复了《姑妄言之》的栏目，周木斋、仇山（唐弢）、何文介、公西华（周黎庵）等都有杂文发表。

这一阶段杂文运动的特点是：主要矛头明显地指向了国民党顽固派；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冒出了吴绍彦、祁翔遥、鹿非马（钱今昔）、金不换等一批后起的杂文作家。他们笔下的锋芒比起第一阶段那些老杂文作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阶段，那些老杂文作家仍在执笔，他们的风格更深沉了，提问题更注意艺术。

很明显，当时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股杂文运动的新势头还在方兴未艾。《奔流新集》之二《横眉》印成之日，刚好是1941年12月8日，但这一日，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冲进上海的租界，而使琵琶一曲，突然弦断声息，上海由是转入了更黑暗的另一时期。

抗战了，还要不要迂回曲折的杂文

——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

杂文算不算文学作品？它有没有“永久的美文价值”？这是自鲁迅始创杂文以来，至今争论不休的问题。这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论辩。从这个观点看问题，那么发生在“孤岛”上的这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只是整场论辩长途中的一站。

但“孤岛”上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又有自己的特点。这是鲁迅逝世后关于杂文的第一次大论辩；这场论辩，又是在抗战爆发了这样的新形势下发生的。

论辩是由继巴人之后接编《每日译报·大家谈》的鹰隼（阿英）发起的。当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之际（1938年10月19日），他在《大家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守成与发展》的短文，提出了：“如果鲁迅不死，他是不是依旧写着这样的杂文，还是跟着抗战的进展，而开拓了新的路？”的问题。他自己的观点是鲜明的：“决不会再象在过去禁例森严时期所写的那样迂回曲折，情绪上，也

将充满着胜利的欢喜。”“他的新杂文，将是韧性战斗的精神，胜利的信念配合着一种巴尔底山的，突出的新形式，明快，直接，锋利，适合着目前的需要。”论争展开不久，庞朴和杨晋豪又几乎同时“杀”出，参加阿英的阵线。庞朴在连载于11月21日至25日《华美晨报·镀金城》上的《风雨杂奏·论“鲁迅风”》里，以赤裸裸地轻蔑的姿态，骂倒“鲁迅风”杂文，说它“看不懂”，“在‘写作不自由’的掩护下，碰碰一句话要绕三个大圈子”。杨晋豪的批评，也是针对它的“转弯抹角地嘲骂”，但他不象庞朴那样赤裸裸地轻蔑，而是从“极需要写给最大多数的大众看的文章”的角度来加以否定，把迂回曲折的杂文和大众的需要看成是矛盾对立的。此外，他还提出如下几个观点：象《忠告英国政府》、《致山川均书》等类的文章，“似乎不必在中国刊物上占篇幅；因为这些文章对于中国老百姓，有点儿不关痛痒，不是急需看的”；“批判汉奸理论的文章，我们自然是极需要的。不过，要是大家不大看到的老牌汉奸报纸或刊物上的汉奸理论，却用不着费尽力气把它特别转引过来转弯抹角地嘲骂。”“只要提出某某是汉奸报纸或刊物，也已足够”；认为杂文写的一些道理，都是“常识性的理论”，而杂文作家“要学什么作家的作风而又学不象地咬文嚼字，却决不是大众所能看得明白的”^⑩。这里又把反驳谬论和教育人民截然地割裂开来。

应该说，阿英的观点是有失着之处的。可惜当巴人应战的时候，他没有冷静地抓住这一错误观点的中心加以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而是耿耿于阿英论述时几个“有人”的举例，并担心小报造谣他离开《译报》是由于内部矛盾倒反而被“证实”，于是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纠缠不休；态度也很不冷静。正确而不冷静的巴人遇到不正确而冷静的阿英，从表面上，人们的同情面反到了阿英一边，这也为庞朴和杨晋豪的进一步攻击创造了条件。

只要认真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庞、杨的观点和阿英的观

点是有所区别的。阿英的文章，反对在抗战爆发的条件下继续写鲁迅式的迂回曲折的杂文，却并不全盘否定鲁迅的杂文；而庞、杨的文章，都是在批评迂回曲折和读不懂的名义下，全盘否定这一类杂文，既无时代区分的概念，也无作家区分的概念。庞、杨所论，如果不是随声附和，那就更糟，是出于对杂文的本能的偏见，根本谈不上是对当时出现的杂文总貌的科学分析。当时出现的杂文，如我在上一章所论述，即使有少数的确比较晦涩难懂，但大多数是锋芒毕露而冲刺的，其教育群众、鼓舞人心的作用，不容抹煞。即使比较晦涩难懂的如辨微（周木斋）的杂文，其极大部分作品，都是启发人对事物作辩证的思索，锲中各种谬论的膏肓，决非一般“常识性的理论”。恰如柯灵当时一度说过：“上海的忙迫造成一般读者的急性，他们要的是开门见山，不假思索，这类读者自然不会有心得。但真要读书，即使是小说，有时却也要点硬头皮的韧劲。”^③

当阿英文章出来的时候，应战的只有巴人一人，而且“源新（郑振铎）先生”还深夜给巴人“来了一封信，说千万不要回答”；许多朋友也劝巴人：“我们不放弃斗争，但我们不作无原则的斗争。”^④及至庞、杨双双出击，所有景仰和追随鲁迅的杂文作家几乎全部上场应战。《世纪风》接连出了两个特辑（11月27日和28日）加以反击，驳斥以反对“鲁迅风”为名“抹煞或估低鲁迅先生杂文价值”的谬论。这里不乏有分量的作品，例如被认为文章最晦涩难懂的辨微的《赋得内煎》，以他一贯的辩证剖析之笔，把内煎与外攻的配合关系、“孤岛”上有人“以自己的有用文字煎着别人的无用文字（实际上应加引号——引者）”和内地有人“以自己的无用文字煎着别人的有用文字”的呼应关系，刻划得淋漓尽致；马前卒（唐弢）的《帮手与帮口》，以庞朴射过来的“帮口”的恶箭，挂上顽固派走卒过去动手破坏鲁迅纪念活动，今天又动口骂倒鲁迅式杂文的事实反射过去，使谁是顽固派真的帮手与帮口，

一目了然；的确大快人心。不足的是，真正回答中心问题的作品，还是不多。文载道的《窗下谈文》，约略提到了产生迂回曲折文字的根源：在“孤岛”上，“不能不说的话太多太多了，然而各方面的阻挠与顾忌也一样有‘太多太多’之感”。那时还是暨大学生的林祝敌，在《关于鲁迅风》一文中，认为“鲁迅风”杂文“是白刃战中最厉害的工具”，而“杂文是一种武器，它的目的只在打败敌人，至于使法没有定则，少林派可以，武当派也可以，效力得到就行。”其中说得最明朗的，却是《大美报·早茶》上的圣人：

我却觉得真的“鲁迅式”却是需要的。虽然，现在不是军阀时代了；但是恶势力还没有根除，还需要我们笔杆的努力！

虽然，现在举国一致的在进行长期抗战；但是腐败，落后，卑鄙还是到处都有，我们还应当有“鲁迅式”的文章和人！^⑮

在文学理论领域里，有两篇支持“鲁迅风”杂文的作品值得注意。一篇是孙一洲的《向上海文艺界呼吁》^⑯。孙一洲即孙冶方，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文委的负责人。在这篇文章里，他一方面批评阿英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的文学遗产中重要部分之一——杂文——的重新估价问题”，并从“七、八年前”阿英就出现过低估鲁迅作品的价值问题，指出这一次是重现；另一方面又指出这场已经延长了一个半月之久的论争“给予一般读者的印象恐怕只是意气用事和私人攻讦而已”，“似乎没有谁曾经抓住鹰隼先生所提出的这个中心问题。”对鲁迅杂文的评价，他认为：“正是在他的杂文中，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最直接明快地，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社会，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对新阶段还要不要鲁迅式的杂文，他提出了如下引人注目的见解：

在我模糊的印象中，记得若干年前苏联文艺界中也曾有人怀疑

到那位善以尖刻的笔调讽刺农奴时代的黑暗腐败社会的伟大作家 戈果理的作品在今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但是苏联最大多数作家的意见却认为戈果理的文笔不仅是暴露黑暗的农奴社会的有力武器，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社会中仍旧是揭露一切内外敌人——帝国主义、富农、资产阶级分子、托派反革命匪徒，以及各种意识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的旧时代的残余——的最厉害的工具。

另一篇是宗珏（卢豫冬）的《文学战术论》^⑦。据文章的《前记》透露：这篇文章“从写成到现在足足有一个半月了”，曾遭到压抑无法发表。“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是极力反对不容论争获得正确的发展，只图用解决人事纠纷的手腕来结束论争的人。此文的发表也就是对于一些有‘顾忌’的朋友所提出的一个抗议。”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进步的文艺界一种不太正常的风气——争则意气用事，息则是非不分；也反映了那些追随鲁迅的杂文作家的工力还不逮鲁迅，成熟也不逮鲁迅的一个方面。宗珏支持“鲁迅风”杂文，则偏重于对“孤岛”现实的分析：

……激昂的申诉或嘹亮的呐喊，能够促使大家兴奋的文章，固然是我们所深切希求，但是我们也得估量到“孤岛”目前底客观的形势。——而且，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尽情恣意，直索的嘻笑怒骂，也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要求，强使每个作家都这样做。

不知这是不是宗珏所说的“只图用解决人事纠纷的手腕来结束论争”的产物，大概在十二月下旬，由《每日译报》主笔钱纳水把卷入这场论争的各方都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结果就出现上文谈及的那个《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尽管带着调和的色彩，但对“曲折讽刺”的杂文终于承认了它应有的地位：

鲁迅杂文的风格在现在，决非失却存在的价值，而且要更积极地发挥其特殊性。

我们不同意那种认为现阶段不需要曲折讽刺的风格的说法，同时也不赞成那些除“鲁迅风”外无杂文的偏见。